

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谭良嘯

(成都永陵博物馆, 四川 成都 610041)

提要 本文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十个月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所思所想,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从刘备在白帝城的十项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思索战败原因,主动承担战败责任,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了蜀、吴交战状态,思念妻室,眷恋子女,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以保住基业。本文还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

关键词 刘备 白帝城 十项措施 三个阶段 明智抉择 完美辞世

中图分类号 K2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10)06-09-09

公元 221 年七月,刘备在即位三个月后,不听臣下劝阻,拒绝东吴的求和,便大举兴兵伐吴。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率军相拒。蜀军先头部队攻破孙吴的巫山,进驻秭归。次年二月,刘备率主力进至夷道猇亭,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他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并联络武陵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列营与吴军对阵;又命黄权驻军长江北岸,以防魏军。陆逊实施战略退却,集中兵力,坚壁不战。222 年闰六月,待蜀军疲惫不堪时,他乘盛夏用火攻,大破蜀军前锋,斩冯习、张南。刘备退保马鞍山,陆逊督军围攻,蜀军又败,损失近万人。刘备乘夜突围,退到秭归。陆逊纵兵追击,连破蜀军四十余营,挺进至巫县。刘备狼狈逃回白帝城。史称夷陵之战。

从公元 222 年闰六月兵败退驻白帝城,至次年四月二十四日病逝,刘备在白帝城住了整整十个月之久。这是他的事业从顶峰跌入低谷后的十个月,是他一生奔波拼杀后栖息下来的十个月,是他生命走向终结的十个月。这十个月,除人们最为熟知和讨论最多的托孤外,他还做了很多,想了很多,然而鲜有人详细论及。现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的所作所为,加以分析探讨,寻求他的思想轨迹,以深刻认识刘备的人生和托孤的涵义。

检阅史籍,可以看到刘备在白帝城期间先后采取了诸多行动,为补救战败、稳定局势、为他死后的蜀国作了一系列安排。

1、调兵增援,阻击孙吴追兵。

刘备及其残兵败将退驻白帝城,“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蹙先主军,屯驻南山”。吴军一直追踪到白帝山东南的南山驻扎,孙吴将领徐盛、潘璋等“竟表言(刘)备必可擒,乞复攻之”。于是刘备急令“(赵)云进兵至永安”。东征时,赵云被留在江州督守。同时,巴西太守阇芝得知刘备败绩于猇亭,即“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遣(马)忠送往。”刘备见到马忠与之交谈后十分赏识其才干,对尚书令刘巴说:“虽亡黄权,复得狐笃(即黄权),此为世不乏贤也。”蜀汉两支增援部队到来,刘备在白帝城稍稍安下心来。孙吴见刘备有了援军,又迫于曹魏大军的覬覦,便收兵退还巫县。蜀、吴双方因此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刘备得以安稳驻扎在白帝城,然后着手了如下事务。

2、“改鱼复县曰永安”,建临时行宫名曰“永安”。

3、“宽宥黄权之室”,不予追究。

4、“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5、结束蜀、吴交战状态,重建双方友好。

6、“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迁葬于蜀”。

收稿日期 2010-08-09

作者简介 谭良嘯(1944—),男,成都永陵博物馆,研究员。

7、在尚书令刘巴病逝后，“征(李)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

8、公元223年二月，召“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

9、同年四月，“病笃，托孤”，“遗诏敕后主”。

10、同时“遗诏事惟大(太)宗，动容损益”，要诸葛亮从简办理丧事。

以上是从史籍中搜录出的刘备在白帝城期间的所作所为。而他想了什么，由于我国史书基本不记载人物的思想活动，我们则难以知晓，只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梳理出他的所思所想，从他的年龄、所处的境况、疾病缠身等等特定环境，去探求其内心世界。

现将刘备的所作所思分为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 思索战败原因，承担战败责任

(一)“营南、北郊于成都”，祈求上苍保佑

在夷陵战败过程中，史书记载了刘备的两次感叹，从中可以寻求他的心境和情绪。一次是在夔道被穷追猛打时。史载：“(孙)桓与陆逊共拒刘备。(刘)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桓斩上夔道，截其径要。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于此！’”孙桓此时年仅25岁，刘备被他追逼，几乎难以脱身逃命，其气恼程度可想而知。一次是在狼狈退入白帝城后。史载：“(刘)备因夜遁，仅得入白帝城，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耶！’”被年轻的陆逊重挫、欺辱，刘备羞怒万分。这句发自内心的叹息，看似平淡，却表露出他极为复杂的心境。

的确，对于夷陵战败，刘备气愤、羞愧、不服、不解。退住白帝城后，他苦苦思索着战败的原因。刘备在恼怒中，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天意，细细一想，自己登基后的确没有来得及举行郊祭天地的大典。于是，他在“(章武二年)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他要在京城成都的南北郊修筑祭坛以祭祀天地，弥补自己的过失，祈求上苍保佑。

关于诏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一事，有学者不以为是一祭祀礼法措施，而认为是诏令营建一系列工程：“包括四项工程：成都北郊，以蜀宫工程为主，为配合运木等，修建了九里堤水利工程；成都南郊，以惠陵工程为主，昭烈庙为其配套工程”。这值得商榷。

“营南、北郊于成都”，一般都理解为在京师成都城的南、北郊营建祭祀天地的场所。郊祀，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这在《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后汉书·祭祀志》里都有记载，而南郊和北郊则是当时郊祀的专用名词。皇帝每年夏至日祭地于方池，地点在京师北门外，称北郊。《后汉书·祭祀志·中》：“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皇帝每年冬至日在圜丘祭天，称为南郊大祀。祭祀天地的郊祀是一国之君重要的祭典，刘备称帝仅三月就因关羽被害和荆州丢失，愤而兴兵东下，没来得及营建南、北郊在夏至、冬至举行祭祀。他在夷陵惨败慨叹“天不助我”后，想到称帝后没有郊祭天地，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赶在冬至前诏令诸葛亮在京师营南、北郊举行祭祀，以弥补自己的过错。所以这一诏令作为重要的事件被专门记载了下来。

然而，说刘备在章武二年冬十月就诏诸葛亮建造惠陵和昭烈庙等，根据不足。那时他是否生病，史载不详；即使生病，他是否就立即着手开始安排陵、庙的营建，不得而知。关于陵园的修建问题，是在刘备死后，诸葛亮向刘禅上奏请求将甘夫人与刘备合葬的表文中才提到。表文曰：“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其意甚明：刘备已死，遗体在运还途中，而甘夫人的遗骨已经到了，好在陵园即将建成，安葬的日子已确定。所以我和大臣们商议请求将甘夫人与刘备合葬。刘备陵园兴建于何时，表文未提，我们也不得而知。

关于丧事，刘备曾遗诏诸葛亮，“事惟大(太)宗，动容损益”，丧事要按照太宗皇帝刘恒的样子，从简办理。西汉孝文帝刘恒一生节俭，实施薄葬。据《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载：“上常衣绋衣(黑色粗丝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只能著短裙，以省衣料)，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刘恒墓)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因山为冢，不垒坟墓)，欲为省，毋烦民。”他在遗诏中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刘恒既然如此，刘备以他为榜样来办理丧事，那么，就不会仅仅只是停留在丧礼的简化上，也应该包括实行薄葬。因此，刘备陵墓建造的时间是否会早到章武二年十月，工程耗时长达七八个月之久还未完成呢？在国力不足、兵败受挫的情况下，刘备既然以崇尚节俭、薄葬

的刘恒为榜样，他是否会那样早就诏令诸葛亮营造（惠）陵、（昭烈）庙？

（二）承担战败责任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对于战败的责任，不归咎于部下，主动承担。他对投降曹魏的镇北将军黄权的妻室不按律令予以处罚，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刘备自秭归将进击吴时，治中从事黄权谏曰：“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而刘备“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

当黄权率军降曹后，蜀汉执法官按律令欲将其妻儿收监法办，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黄权的家人一如以往。胡三省认为“刘备不追究其罪责，‘以不能用（黄）权言也’”。的确，刘备没有采纳黄权的良策，导致了战争失利和黄权的无奈，使“道隔绝，（黄）权不得还，故率将领降于魏”。宽宥黄权的家人，不追究法办，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表明了刘备的心态，说明他是非分明，不文过饰非，不委过于部下，敢于面对失败，勇于承担责任。

附 论析一，伐吴评说

刘备为什么大举兴兵伐吴，为什么一个征战数十年的老将竟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而且败得如此惨？历来众说纷纭。

1、关于伐吴原因

传统的观点认为，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或兼而有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同书《法正传》曰：“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高等学校的两部教材说，刘备“不甘心丢掉荆州，以替关羽复仇为名，调集全部军力进攻孙吴。”“荆州对于刘备也是命根子，是关系成败的大问题，他不能不争。”

近年来一种观点认为，兴师伐吴是尊严和脸面使然。“刘备兴兵东下，除了想夺回荆楚战略要地外，还有一个更为要紧的目的，这就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脸面。董督荆州的关羽，不仅是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而且又是其义弟。关羽死于非命，刘备如果无所行动，无异于被人唾面而让其自干，确实丢人之

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刘备任侠的作风和价值观造成的。有学者认为：“刘备出生贫寒，势小力薄，却能在强手如云的三国时代争得一席之地，我认为，这与他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刘备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好结交，重情谊；2、讲“信义”，重声誉；3、重事业，轻钱财。“出师东吴，发动夷陵之战，是刘备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也有学者指出：“刘备不败于曹操，而败于孙吴小将，因轻忽致败，自然怨叹有余。恩若兄弟的刘备、关羽、张飞，皆败在孙吴的算计之中，实在令人扼腕，而刘备始终任侠的作风，亦是政坛悲剧角色的因素之一。”

2、失败原因——怒而兴兵，战略战术错误

夷陵败绩当然不是天意。战争的胜负关系作战的双方。夷陵一战，孙吴获胜是因其指挥得当，战略战术正确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刘备的惨败，深为后世兵家所重视，纷纷对其教训加以总结。

魏文帝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吴三省评曰：“依险行兵，敌扼其冲，情见势屈；敌乘其懈，至于失师，此非天也。”“曹操赤壁之兵，骄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愤兵也。骄亦败，愤亦必败。况以陆逊为年少书生而心轻之，则愤而益之为以骄矣。制胜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气。善乎先师之言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小其心故能惧，平其气故能谋。”

武国卿先生在评述吴蜀夷陵之战时，归纳蜀军失败的原因为四点：一是战略方针的失误，二是指挥决策的不当，三是犯了“怒而兴兵”的兵家大忌，四是缺乏战将谋臣的辅佐。这一认识较为全面、具体。

二 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蜀吴交战

“永安”命名折射出的内心期盼。史载：“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腹，改鱼腹县曰永安。”

刘备一住进白帝城，就将鱼腹县改名“永安”，并把所建临时行宫也名为永安宫。很显然，意为永久安定，以图吉利。夷陵战败让刘备心力交瘁，县名的更

改、行宫的命名,反映出他因惨败而产生的倦怠。这说明他内心期盼安定,在开始反思这一场令蜀国受到重创的战争是否得当。结束蜀、吴双方的战争状态,与孙吴和好。这是他反省夷陵之战后作出的修正错误的决定。

关于蜀、吴和好这一问题,两国史书记载有异。《三国志》的记载为孙权主动示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亦曰:“(222年)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孙权在夺得荆州后,受到曹魏的威胁,于是派人到白帝城恢复盟好。面对既成事实,刘备也遣使回报。这说明他已意识到蜀、吴联盟破裂的不利,以行动纠正自己的过失。蜀、吴自此结束了敌对关系,当刘备病逝时,孙吴派使臣吊唁。刘备于白帝病逝,“(孙)权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弔备丧也”。

而孙吴方面的资料认为,是刘备先给孙权写信,以示和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云:‘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而“(郑泉)使蜀,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

不过,刘备对于败于陆逊之手其心仍有不甘。“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夷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刘备此刻能如是说,是因为有了赵云和马忠的增援部队,而要重新振兵再战实无能力。陆逊便以大实话把他的虚张声势顶了回去。

方北辰先生不认同《三国志》孙权主动示好的记载,他认为:“遣使请和,这是掩饰性说法,实际是刘备主动求和。”无论吴、蜀谁先示好,双方能结束交战关系,恢复友好,这与刘备兴师伐吴时的态度相比已判若两人。那时“孙权遣使请和,先主盛怒不许”,而今是同意请和,遣使往来。刘备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以实际行动

来加以纠正。

三 思念妻室,眷恋子女

年老体弱的刘备,在白帝城漫长而相对清闲的时日中,当争斗功名都被抛在一边的时候,产生了对家人的思念,心中涌起了对跟随他转战南北而早逝的妻妾的愧疚和内疚。“章武二年,追谥(甘夫人)皇思夫人,迁葬于蜀”的诏令是他这一心绪的体现(对儿女的眷恋则充分表现在遗诏中)。

刘备一生有多少妻妾、后妃,史载不详。在《三国志·蜀书》中有传记的仅两位,即甘夫人、吴夫人,无传而有姓氏、事迹的也是两位,即麋夫人和孙夫人。甘、麋二人是跟随刘备四处奔波,开创基业的两位夫人,孙夫人即孙权之妹,吴夫人即吴懿之妹,则是在他事业有成后的两位夫人。刘备此时特别怀恋甘夫人,因为她是刘备最为赏识和宠爱的一位夫人,也是刘禅的母亲,而且一生备受磨难。

关于甘夫人,《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曰:“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这说明刘备娶甘夫人时已有正室,则时间应在建安元年(196)麋竺进妹于之后。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家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刘备在战败失地、妻子被掳的艰难时刻,富商麋竺进献妙龄娇妹,又送奴仆钱财,这种好事也只有刘备才能遇到。不过,刘备是个重情义的人,以后对舅老馆的回报十分丰厚。平定益州后,麋竺被拜为安汉将军,官位在诸葛亮之上,之后得到的“赏赐优宠,无与为比”,蜀汉满朝文武无人可出其右。

麋竺之妹因哥哥的钜资赞助,成为“夫人”,这应当是“正室”而非“侧室”。从“先主数丧嫡室,(甘夫人)常摄内事”的记载看,麋夫人可能死得比较早。《三国演义》描述她在当阳长坂坡为保阿斗性命投井而死,属于虚构。大概是富家千金不堪随军颠沛流离之苦,或者是对这位穷困潦倒的市井英雄难以产生情感,终日郁郁寡欢因而早逝。

甘夫人,虽生于微贱,处于妾的地位,却美丽贤惠。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载有一事可以证明甘夫人的贤德。其书卷八《蜀》载曰:“先主甘后,沛人也,

生于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集雪。”甘夫人肌肤洁白可想而知，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姑娘。不仅如此，她还贤淑端庄，识大体，有远见。据说有人献一三尺高的玉人给刘备，“后与玉人洁白齐润”，令刘备陶醉。他“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如此造成不良影响。甘夫人见状，告诫刘备说：“昔子罕不以玉为贵，《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于是刘备撤去玉人。“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由于甘夫人的贤德，刘备又“数丧嫡室”，于是刘备令她“常摄内事”，使之成为贤内助。后随刘备转战到荆州，于建安十二年（207）生下后主刘禅。“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与当阳长坂，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后卒，葬于南郡。”在当阳长坂坡，刘备被曹军追逼，他丢下甘夫人和后主逃走，幸有赵云的保护，才免遭大难。

在刘备的妻妾中，甘夫人是最受刘备宠爱的一位妻子。而她跟随刘备打天下，转战奔波，倍受颠沛流离之苦，不仅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而且年纪轻轻即在战乱中死去，尸骨埋在他乡孤独无依。在白帝城，整个身心都完全放松了的刘备，想到甘夫人的贤德和悲苦不幸的命运，思绪万千，因而“笃义垂恩”，诏令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使之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分，并专门派遣使者去南郡奉其遗骨入蜀安葬。

迁葬一事的实施可能颇费时日，直到刘备死后甘夫人的灵柩才运到成都。于是，经诸葛亮上表奏请，后主同意，甘夫人谥曰昭烈皇后，与刘备合葬于成都惠陵。

追谥、迁葬甘夫人一事当在章武二年末，因为蜀、吴交战关系结束之后才能实施。刘备一生征战，曾四次将妻妾子女抛弃；史书也没有关于他儿女情长的描写，仿佛他是一个对家人绝情寡义的人。而追谥、迁葬甘夫人一事，折射出他暮年内心深处的绵绵亲情。

四 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保住基业

刘备于何时生病，史载不详。可能在章武二年冬

或在三年初，开始是痢疾，然后引起并发症。刘备预感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对于死亡，他非常平静，坦然面对，而毕生厮杀创建的基业如何能保住，兴复汉室的目标怎样实现，后继无人啊！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

（一）任命李严为尚书令

刘备住白帝城时，即召尚书令刘巴到身边，当刘巴一死，他就令李严来永安，接任尚书令一职。史载：“章武二年，先主征（李）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关于李严为尚书令一事，有必要作说明。

尚书令为尚书台的长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尚书”本是九卿之一的少府属下的一个专为皇帝服务的机构，即“殿中主发文书”的小吏，汉武帝时，权力增大，成为皇帝身边的枢密机构，东汉时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权力和地位在三公之上，成为包揽一切的大总管。大臣若不“领尚书事”、“平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就无“奏事之权”。

蜀汉沿袭汉制，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为汉中王时即设尚书台，当时以法正为尚书令；一年后（220），法正卒，以刘巴代之。刘备驻白帝城后既建行宫，同时将尚书台移来，作为自己身边处理朝政事务的机构，刘巴因此被随即召到永安。从黄权领援兵到永安后，刘备对刘巴称其才的记载可以证明刘巴已在永安了。史载刘巴“章武二年卒”，刘备便召李严到永安，接任尚书令。因此，李严的任职，只是尚书令职务的正常更替，只是一种正常的职务安排。

有学者认为：“刘备之初，名义上设丞相，不设尚书令。……（在白帝城）时刘备突然新设了尚书令，又留在身边，显然刘备是要在身边重新建立一个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尚书’机构。”这一论断是有误的。

蜀汉虽设尚书令，其权力显然没有东汉时期大。刘备称帝时，诸葛亮为丞相，“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而同时有尚书令刘巴，形成尚书令与丞相录尚书事共同管理尚书台的状况，这说明他俩的权力和作用有限，只能各自分管部分国事。鉴于尚书台二人同时主持的状况，黄惠贤先生分析认为，刘备在世时军政大事均仍由他一人定夺。所以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其权力也是有限的，他被留在永安，也应该是刘

备的安排。刘备死后,诸葛亮辅政总揽军政大权,这既是刘备的安排,也是蜀汉尚书令权力本身有限造成的。有人认为,刘备关于李严的安排是为了牵制诸葛亮,并为二人以后的权力之争埋下隐患,是不妥的。

刘备在世所任的三位尚书令都是益州士人。刘备入主成都,法正明确提出“客主”的概念。刘璋及其部属本是益州的主人,而刘备是刘璋请来的客人,现在刘备反客为主,成为了益州的主人。因此,刘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十分注重协调两部分士人的关系,十分注重取得益州士人的支持。而连续三位尚书令都选用益州人士,正是刘备为协调客主关系、争取益州士人支持采取的措施。方北辰先生也指出:“为了争取刘璋势力的支持,同时也为了使己下中荆楚旧部的力量受到制约,刘备在考虑尚书令人选时,都从刘璋的部属中选拔。法正、刘巴、李严的出任,都有这样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在当前国土丧失、师旅失利、元首病危的情况下,刘备认为提升李严对益州的安定有重大意义。”

（二）交代人事

章武三年二月,刘备病情加重,他召诸葛亮和鲁王刘永、梁王刘理到永安,让太子刘禅留守成都。在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诸葛亮到白帝城后与刘备相处了两个月之久,君臣间曾有过多次交谈。刘备一生知人善任,他谈了自己对集团内一些人的认识和看法,要诸葛亮使用时加以注意。如《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载:“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除此之外,其余的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十分可惜。

（三）临终托孤

刘备在病重将死之时,进行了托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他向诸葛亮属以后事时强调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对于刘备托孤时的正、副安排,及他所说的“君可自取”,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与李严,一正一副,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心计权谋,其实

是基于争取刘璋势力支持的一种考虑,是他平衡客主关系、争取益州士人一贯思想的体现。而他对刘禅和鲁王“父事丞相”的诏敕和付予诸葛亮“君可自取”的特权,已充分说明刘备已把他死后蜀国的军政大权和自己的幼子完完全全交给了诸葛亮一人。

关于“君可自取”,传统的理解为“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如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诸葛亮传》理解为:可以自己取而代之(可以自立为皇帝)。近年,有学者提出认为这一解释不妥。

方北辰先生在《三国志注译·诸葛亮传》中注解“自取”说:“自取:自己选取(处置办法)。意指可以废黜刘禅另立皇子为君。通常理解为刘备要诸葛亮自立为皇帝,恐怕与情理不合。首先,蜀汉与曹魏之所以势不两立,乃在于曹氏以臣代君篡夺皇权,如果要诸葛亮取代刘禅,则是又出一个曹丕,岂不与蜀汉奉行的政治原则完全矛盾?给予诸葛亮废立君主的权力,如同从前的霍光,也就算敬重信任到极点了。其次,取字理解为取而代之,不免有增加文字作训诂之嫌。而选取则是常用之义。”

这一理解颇有说服力,是正确的。有学者进而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解,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就给了诸葛亮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刘禅扶不起,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诸葛亮可以独揽大权,让刘禅处以虚位;也可以废黜刘禅,另选刘备其他子嗣,甚至可以直接继承基业。”

（四）遗诏诸子

刘备在托孤的同时,给他的儿子下了两份诏书,一份是给太子刘禅的一道遗诏,另一份仅一句话,此外还有对鲁王的嘱咐。两份诏书的全文分别录于下。

其一,“先主诏敕后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自汉以下,所以诏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其二,“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一生除了言谈没有文章传世,遗诏是他留给后世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文献。遗诏记录了他的死因,反映了他在离开人世时对为人处世的看法,流露出对子女的眷恋和期盼,并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分遗诏是一代枭雄临死前的真情流露,内涵十分丰富。首先,刘备面对死亡表现得坦然、超脱,只是对未成年的刘禅兄弟则有着太多的牵挂。其中“五十不称天,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是他临终前心境的袒露,体现了他的豁达和儿女之情。其次,刘备对儿子提出为人处世和学习的要求。“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是他角逐天下的人生感悟。因此,他要求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定要努力践行,行善积德,才能立身于乱世。两个“勉之,勉之”,可谓言之谆谆,将刘备深沉的父爱,殷切的希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也成为后世育人教子的警句。同时,他强调才智的作用,要求儿子读经、读史,还要“历观诸子”,学兼众术,以期“益人意智”。

最后,明确诸葛亮的相父地位。刘备分别嘱咐刘禅和鲁王,“父事丞相”。这句追加的诏敕,很显然也是为了再次明确、强调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的主导地位。这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说明他托孤的真诚实意,说明他对儿子能力的深刻了解。对儿子的诏敕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嘱托话语一脉相承,是一种补充和强调。

附 论析二,托孤评说

刘备的托孤,是君臣永别之际的肝胆相照,是他以事业为重胸怀的表露,不仅启诲着后来的君臣,也感动了广大士人,受到高度赞扬。对白帝城托孤最先的赞颂者是晋代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评曰:“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陈寿对刘备的托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美,他认为,刘备把整个国家和儿子托付给诸葛亮,而内心毫无另外的想法,这实在是君臣间的大公无私,古往今来的美好典范。其后,常璩完全赞同陈寿的认识,在《华阳国志·刘先主传》

末论赞曰:“及其寄死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陈子以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而袁宏(328--376)在《三国名臣赞》赞诸葛亮曰:“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在此后的时代,评赞白帝城托孤的不绝于书。唐代尚驰在《诸葛武侯庙碑铭并序》说:“先主创业未半,中道而殁,遗诏邦家之事,大录于公,敕后主事公如父。至于职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昔周公赋《鸛鸣》之诗,成王启金縢之诰,此虽大同小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则莫能至是。”宋代郭大有《武侯受遗命赞》曰:“自古顾命,未有若季汉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尧舜揖逊之气象,孔明之对,有伊周笃裴之忠爱。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专,与日月争光可也。”元人胡三省曰:“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清人赵翼评论刘备托孤语曰:“千载之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曹)操得(诸葛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然而,历史上也有人从君臣关系的准则提出质疑,说“(刘)备之命(诸葛亮),乱孰甚焉!……后篡逆之途”。时至今日,也有学者认为,“刘备的托孤之辞,阴怀诡诈”;“是对诸葛亮的考验”等等。

刘备的托孤言行,并非“诡伪之辞”,也不是在玩弄权术,而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来考察,就更清楚刘备为什么要这样作;认真地考察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形成的情义,认真考察刘备在白帝城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会明白托孤是刘备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是刘备的一次英明抉择。

(一) 首先是当时的斗争局势使然

汉末三国托孤时言“自取”的事件并非刘备这一孤例。孙策临终时,以弟孙权托付于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又如,荆州牧刘表病笃,托孤于刘备说:“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后,卿便摄荆州。”而徐州牧陶谦临死前说得更直白:“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他命州人迎刘备,强使之成为一州之主,而没有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承袭州牧之职。

刘备亲身经历的陶谦和刘表的这两次托孤，都是因为后代无才能继承基业所致。在陶谦让州牧之位于刘备、孔融要他继位时曾说“今日之事，百姓与能”，这话应该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他临终时“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感悟就是明证。

为什么汉末三国时有的托孤者能申言“君可自取”，我曾经撰文说：“弱肉强食是当时激烈兼并战争的规律。要巩固自己的地盘，进而争夺天下，割据者必须成为强者。他们在临终时都会考虑，自己打出来的地盘，挣得的那份家业前途将如何呢？其中明智者作出了这种选择。如果自己的子弟是弱者，地盘将为对手夺去，就不如让给亲近贤明的属僚，子孙仍不失富贵。清人桂馥在《晚学集》中说，刘备托孤言‘君可自取’，是‘自叹大业未就，又无克家之嗣，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之为快？此真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所能窥测也’。”

因此，向受托者申言“可自取”，是汉末三国的争斗形势使然，是明智的托孤者的明智之举。

（二）诸葛亮的德才和二人君臣间的诚信关系所致

刘备和诸葛亮从相识到相知，此时已相处十六年（207—223），对诸葛亮的品德、忠贞、才识，应该十分了解认同，刘、葛二人间已达到完全信赖的程度。古今评论甚多。例如，裴松之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宋·胡寅说：“或谓昭烈自知刘禅之不才，群臣无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与禅也，故于临终正言之，冀亮德己而不忍取。呜呼，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怀夷旷，磊磊落落。与孔明兼君臣、师友之契。三代以还，未见其比也夫！岂以欺诈相待，如市道之交乎？”学者吴玉莲认为：“刘备对孔明的认知与信赖完全表达于遗言之中。刘备待臣下一本至诚，视其与关羽、张飞等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便可知他的宽仁弘毅，情深义重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改变了他一生事业行径的孔明，临终当然托以重任。这一方面证明了刘备对孔明的全然信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以天下为重的大公无私。刘备欲以继续汉家天下的宏愿，虽未达到，却在此遗言中，透露了他的政治主张，能安国定大事者，始有天下，故明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为生民立命的情操，一如他的仁

厚，终而大放异彩，而使其名垂千古。”

（三）刘禅年幼，才智平平，难堪大任

刘禅当时不满 17 周岁，其才智平平，在天下激烈纷繁的争斗形势中，他难以担当起保住基业的重任。《三国志·蜀书》中对于刘禅才智的记载甚明，古今认识较一致。

刘备对汉末三国时弱肉强食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诸葛亮的德才和君臣间的诚信令他十分放心，其子的年幼和才智，难以承继基业，实现复兴汉室大业，因此他托孤并申言“君可自取”。刘备撒手人寰可能带着遗憾，但是却很平静、坦然的，因为他把未尽的事业和希望托付给了一个自己信赖的人，一个有才德的人。

在白帝城，刘备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围绕夷陵战败的善后事宜进行，中间闲暇阶段他得以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后阶段因病思考并安排身后之事。

刘备以帝王之尊，意气风发率军出征，到被年轻将领打得狼狈逃窜，因而不解、羞愧、愤懑，而惨痛的失败又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应该是他初期的思想情绪。当刘备的心绪从战败的气恼、郁闷中慢慢趋于平静时，他痛定思痛，思索检讨夷陵战败的原因，于是主动承担战败的责任，结束与东吴的交战关系，恢复盟好。而改鱼腹县名永安，将临时行宫也命名永安，诏令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北郊以祭祀天地，则表达了拼搏一生、心力交瘁的刘备对安定的渴求。

当围绕夷陵战败的诸事处理完毕，按常理他应该回成都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如果是病了，他生病的时间不详，而回成都则可以有条件更好地治病。如果说驻扎于此是还想夺回荆州，他已经承认了不能跨有荆、益的事实，与孙权和好。如果说是因惨败无颜再见蜀中父老，一生饱受屈辱的刘备曾被视为“脸皮最厚”之人，他的心理不会如此脆弱，何况国土、兵力尚存。由于史书没有记载，不少学者作了种种推测，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一生征战的刘备身心完全松弛了下来，他在白帝城度过了一段相对安详、平静的日子。从登基称帝、跨有荆、益而三分天下，如今折兵失地，事业的大起大落会让他想很多。“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⁶² 岁这种年龄，面对峡江滔滔流逝的江水，在

这种环境里,然后再加上疾病困扰,会让人追昔抚今。从他下令追谥甘夫人并迁葬于蜀,其后在遗诏中表现出的对死亡的泰然、对儿子的深切眷恋、不放心和谆谆叮嘱,他一定想了很多很多。回首从24岁起兵闯荡天下,在近40年里,有着太多的艰辛,“历齐、楚、幽、燕、吴、越、秦、蜀,艰难留庙祀”,倍受颠沛流离之苦;有着太多的凄怆,先后投靠依附于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部众多次被击溃,妻室四次被对手俘虏。命运多舛啊!不过,他想到自己从一个贩履织席之人,无资产和社会背景可凭借,躬行仁义,打出了一片天下,登上了皇帝之位,因此也有几分释然,几分欣慰。他通达地面对死亡,发出“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的慨叹。只是对妻室儿女有着太多的亏欠,而他能弥补的就是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并迁其遗骸归葬于蜀。当他病情日渐严重时,如何保住这份历尽艰辛创下的基业,让妻室儿女而不再次沦为他人之奴,享受荣华富贵,则让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围绕身后的安排,刘备首先选任辅臣。他以诸葛亮为主,李严为副,这既突出了主次又平衡了关系。然后,对诸葛亮进行了特别的嘱托。嘱托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含义深刻而丰富,分三层意思层层递进:首先肯定诸葛亮的才能,“君才十倍曹丕”;其次激励他去完成一统大业,“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最后表达了充分信任他对自己儿子的辅佐,“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同时,又作了一些相

关的交代,如遗诏诸子“父事丞相”,“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等等。当他(甚至包括葬礼)——交代安排完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刘备一生,人格表现出矛盾和复杂性。他侠义正直,仁爱厚道,重感情讲道义,成为得人心的英雄形象;然而又数次背叛甚至攻击优遇他的诸侯,被视为反复难养的枭雄。为什么呢?这是当时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多次惨痛的失败给予他的教育,是他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为求生存、谋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多面性格。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情有主流支流,评价他的时候应该分清主次;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境遇中其思想、行为会因之而变化,评价时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观刘备在白帝城的所作所思可以看出,托孤是年老的刘备在夷陵败北、病魔缠身、行将就木之时,以平静的心态冷静思索的结果。他在这最后的时日里,心境日趋安详,对人处事日渐平和,已经没有昔日一代枭雄的锐气和风姿。正是这种淡定的心境,使他对后事能够平心静气地反复思索掂量,进而作出周密仔细的安排。把对托孤这一事件的认识置于当时的环境中,那么,就会认同陈寿的评判:白帝城托孤,是历史上君明臣良的一段佳话。历史的进程也证明,刘备的抉择是明智的,托孤于诸葛亮是正确的。

在白帝城的十个月,是刘备一生中的最后时日,是他一生中极为精彩而重要的时间段。在这里,他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Liu Bei's Stay in Baidi City

Tan Liangxiao

(Chengdu Yongling Museum, Sichuan,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what Liu Bei did during his ten month's stay in Baidi City, revealing his thoughts and exploring his mentality and environment Liu Bei took when he entrusted his son to Zhuge Liang. It can be seen from his ten measures taken in Baidi City that Liu Bei initiatively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at after introspecting the reasons for his defeat; looked forward to peace and ended the state of war between the Shu and Wu States by correcting mistakes; made arrangement of personnel and appointed his successor with his love of wife and of children, and entrusted his son to Zhuge Liang so as to keep the succession of his power. Also,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proves the reasons for his war to the Wu State and his failures and his wise decision to entrust his son as well.

Key words: Liu Bei in Baidi City; ten measures; three stages; wise decision; die with no pities